第 38 卷第 4 期
2008 年 7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8, No.4
July 2008

国际论坛:休闲学研究前沿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08.04.003

北美休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杰弗瑞·戈比[1] [韩国]沈杰明[2]

(1.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娱乐、公园和旅游管理系,宾夕法尼亚 大学城 16802;
2.东国大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系,首尔 100715)

[摘 要]在北美,休闲学的大学课程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休闲学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如社会群体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流畅理论等。有关休闲制约和协商的理论有助于认识积极的生活。在北美,大众休闲具有牢固的传统,因此中国的休闲研究绝不能无视普通公民获得更大休闲机会的巨大社会需求。该研究必须着重了解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这些变化,了解休闲服务供给组织的需要;同时,该研究的发展还必须符合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历史。考虑到中国社会更具集体性这一特点,休闲人口分析研究应先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如何在未来十年里打造休闲产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北美;休闲研究;工业化;城市化;中国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Implications for China

Geoffrey Godbey[1] Jaemyung Shim[2]

(1.*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Park and Tourism Managemen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tate College* 16802, *U.S.A.*; 2.*Department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Dongguk University, Seoul* 100715, *Korea*)

Abstract: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curricula devoted to leisure studies began in the 1940s. Leisure theory draws heavily from other disciplines, esp.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such as theories about social group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Flow theory.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negotiation theory has contribute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become active in a leisure in a leisure activity. In North America, there is a strong tradition of public provision of leisure services, so the leisure researchers in China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the huge social need for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leisure for the average citizen. The study of leisure in China must seek to understand those changes in leisure which have occurred due to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need for organizations that provide leisure services; but such understanding must evolve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收稿日期]2008-04-23

[作者简介]1.杰弗瑞·戈比,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娱乐、公园和旅游管理系教授,主要从事休闲学研究;2.沈杰明,男,韩国东国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休闲学研究。

[译者简介]1.刘晓杰,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译审;2.刘慧梅,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more collectiv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may mean that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with regard to leisure takes precedence over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ies . How leisure is shaped in the next decade will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determining China's future .

Key words: North America; leisure studies; industralization; urbanization; China

一、引　言

中国正在经历自己的工业革命。与这一革命相连的是，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收入的增加，对工作之余和家庭之外的生活机会的期待，人员流动性的增加，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与之同步的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对休闲、玩耍、娱乐和旅游的态度的转变。在某些方面，中国工业化的影响与其他经历过此过程的国家如出一辙。然而，在许多更深的层面，由于复杂的原因，诸如极高的人口密度、儒教和道教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的辨证思维，中国的工业革命有其独特的一面。

随着节假日的增多、每周工作日的减少，中国城市居民的空余时间增加，闲暇时间的使用因而变得更为重要。“休闲经济”一词常常被用来表示各种形式的休闲——不仅是旅游——在新兴的中国经济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如何利用休闲也成为青少年成长、家庭和睦、老年人康乐和独立，以及人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变量。

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学术上研究休闲。例如，召开了学术性和实用性的会议，探讨休闲经济、休闲与家庭、旅游开发、“休闲城市”、运动普及等相关议题；来自西方国家的许多有关休闲的专著被翻译过来，学者着手撰写有关休闲各个方面议题的专著和论文，诸如使黄金周多样化、休闲与传统女性行为准则的关系、“休闲城市”的概念等。在浙江大学建立亚太休闲研究中心，乃是探讨休闲的学术关注和努力的另一标志。随着中国休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该研究领域在北美的发展做一回顾。这并非是建议中国应该精确地跟随北美休闲研究的步履，事实上，跟随北美只会事与愿违。但毕竟了解其他国家休闲研究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关注休闲研究的中国学者创建他们自己独有的探索模式。

二、休闲研究的起源

休闲研究和娱乐与公园管理的学术内容是从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视角发展而来的。娱乐与公园管理源自 19 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各种旨在塑造和改革娱乐的公众活动[1]，对娱乐和休闲本身极少关注。当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非工作性活动的能力，目的在于帮助穷人、儿童、老人、残疾人以及农民，改善他们的健康、教育、社会调节和生活机会。这些农民原来的娱乐生活都是基于农业的。在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城市里缺乏资源来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娱乐方式。这些公众活动也通过改善他们的性格和使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角色更有韧性，来重塑农民心态。在这些公众活动中，娱乐和休闲不仅得到学术上的探讨，还获得从道德和战略角度的关注[2]。

各类旨在建立公园的活动围绕着适应城市化、保护自然和增加健康的娱乐机会而展开。多数由娱乐和公园推动的活动是身体活跃型的，包括竞技体育、运动、户外娱乐、舞蹈和有监管的玩耍。一个主要的焦点是使用经挑选的娱乐形式来活动身体、发展性格、增加社交技能、促进教育，以及接触大自然。这些运动的目标与当前各种提倡积极生活的目标相吻合[3]。

休闲研究起源于一个不同但又关联的传统。它最先从欧洲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发展起来，关注

工业社会中不断增多的闲暇时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4]。早期的探索聚焦于每日生活中的工作—休闲模式、时间的利用、郊区化和工业工作等[5-6]。后来的探索专题则包括社会阶级、科技、社区生活、有组织的休闲,以及工作安排对休闲行为的作用和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的框架越来越多地被休闲研究所采纳。

在北美,针对这些专题的大学课程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虽然同一系科既研究休闲,又研究娱乐与公园管理,但它们大多数主要关注学生的职业训练,使他们能成为公共娱乐与公园、治疗性娱乐和户外娱乐机构的领军人物。教师的研究围绕着对当代社会休闲的认识以及娱乐与公园服务的供给等问题。主要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这些期刊早在1969年就开始正式刊发文章,包括《休闲研究杂志》、《休闲科学》、《休闲研究》、《公园与娱乐管理杂志》、《治疗性娱乐杂志》和《世界休闲》等。

三、政府娱乐与公园服务部门

娱乐与公园服务在所有现代国家里都是重要的政府功能。这类服务可以在除了具有征税权限的特别公园和娱乐区之外的市、县、州和联邦一级见到。虽然州公园和联邦土地管理机构,诸如美国森林服务部和国家公园服务部提供众多的娱乐机会,但市级娱乐与公园服务部门拥有的使用者要多得多。1992年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发现,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当地的娱乐设施与公园服务部门(从那以后尚无更新的全国数据)[7]。除了76岁以上的人群外,受调查的四分之一人群表示他们"频繁地"利用当地公园。偶尔使用娱乐与公园服务者的数量范围从57%的较年轻人到29%的76岁以上人群。参与这些机构发起的娱乐活动和项目的人群范围,包括了从39%的15至20岁的年轻人群,到11%的76岁以上老年人。

娱乐与公园服务部门占地方政府开支的百分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维持不变[8]。但是联邦政府对市政的补贴在下降,提高的门票价格和其他形式的收入对此进行了弥补。这类服务的人均消费在1999—2000年平均为74.58美元,其中20美元用于投资项目。各州情况差异巨大。自产收入,以常量、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美元计算,在此期间增长可观,大约三分之一的运营资金来自用户[9]。以常量、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美元计算,地方政府在公园与娱乐方面的总开销,从1976—1986年期间有所减少,但是从1993—2000年期间,则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年均为5.95亿美元。同一时期,政府用于规划及发展娱乐和公园的土地和建筑的投资增加了58%。

联邦用于娱乐与公园的开支虽然难以测量,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在减少。例如,1965年的"水土保护基金法",为各级政府提供获取、规划和开发公共重要性的土地,包括城镇、州和国家公园以及户外娱乐区域的资金。1987年,国会授权拨款给该基金每年9亿美元,直到2015年,但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拨款却远低于这个数目。

此外,大多数联邦经费并不提供户外娱乐与公园区域和设施的维护。因此,虽然许多城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增加了它们的娱乐基础设施,但维护经费则基本滞后。再者,过去的十年间,市政娱乐与公园服务当局越来越受市场驱动。也就是说,虽然它们的大部分经费仍然来自税收,但它们被要求从参与者的收费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要像对待顾客那样对待公民,以此来满足他们各自的娱乐需求,且经常使用服务品牌来宣扬它们的机构。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公园服务的目的存在一种哲学的真空。公园的设计变得标准化了,"与具体的文化、气候和人口几乎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10]48。虽然美国的公园、游戏场地、其他娱乐场所和设施的设计几乎仍没有以创新来反映多样性,但公共娱乐与公园机构已经变得越来越关心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尤其在推动身体锻炼和减少心理压力方面。

四、休闲研究和娱乐与公园管理的概念和方法

虽然休闲理论大量借鉴其他学科，但它们在休闲研究中的应用仍反映出休闲学独特的一面。休闲常常具有社交性，其主要特征为快乐、相对自由、具有内在动机等。通过生态系统方法能对休闲有较好的理解[11-12]。首先是研究人类自主（autonomy）和能动力（agency）的休闲理论。自我决定理论（SDT）[13]有助于认识内在动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内化外部回报（如奖励），从而产生更加内在的行为。同时，自我决定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在存在制约的情况下休闲行为如何得以开始和维持。有关休闲制约和协商的理论在帮助认识积极生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14-15]。

休闲制约一般分为三种：内在制约乃是个体内在心理环境，诸如个性因素、态度和自我实现；人际制约源自与他人的互动，诸如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结构制约源自外部环境的因素，诸如机会匮乏或者活动成本高。另一自我调节理论——选择优化补偿[16]提供了重要的元理论框架，考察面向目标的休闲行为。选择休闲目标的过程（如园艺或山径徒步），克服对该活动的制约（补偿），以及使个体的体验最优化，皆在该理论中得到充分阐述。

奇克森特米哈伊的流畅理论提出，如果个体有明确的目标，个体的表现容易被评定，而且其技能水平也足以应对该活动的挑战，那么个体的活动参与就能得以实施和维持。当流畅得以实现，个体经历强烈的享乐和满足，这样就会促进持续的参与[17]。这一理论有助于认识休闲情境中的无聊（boredom）和焦虑（anxiety）。

休闲行为专业化的概念区分了“严肃休闲”和“业余休闲”。这一区分使人们意识到许多休闲行为带有与工作职业相同的特性：参与者会变得更有技能，表现出对该活动更多的投入，在语言、器材和技术上变得更专业以及将这种参与融入他们的自我概念中[18-19]。

休闲社会化乃是一个重要概念，与积极生活研究紧密关联[20]。休闲研究已经探索了整个生命过程中休闲活动节目如何开创、维持和受限制。社会化的主要模型聚焦于童年时期的经历或成年和晚年的体验在塑造休闲偏好上的主导作用。

另一套休闲相关的构建则更具应用性。它们的讨论通常直接演化成管理政策和实践。有关社会群体的理论，诸如拥挤（crowding）和冲突（conflict），对认识社会承载能力和群体间冲突至关重要。拥挤——大多在户外娱乐背景下被研究，立足于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即人们具有评判行为的标准）。规范一般受访客的个人性格、在经历中遇见的人的特性以及诸如公园质量和特点等情景因素影响。拥挤典型地被视为一个消极现象，太多人数的存在对使用者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21]。然而，对拥挤的认知会因经历、动机和期望值而不同[22-23]。冲突是一相关的概念，是“归因于他人行为的目标干预”的结果[24]。冲突可能由动机、期望值、价值观及一人或多人所遵守的标准不协调而引发。拥挤和冲突对于积极生活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两者能够塑造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决策。例如，老人可能由于感觉到滑轮者和徒步者之间的拥挤和冲突而不愿使用一条具有多重用途的路径。

人种/种族、社会正义和文化理论也是获得休闲行为生态认识的重要因素，并表现在基于休闲的身体运动的认识程度中[25]。例如，调查表明，在一般情况下，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相比，更偏好开阔、精心修整和含有建筑的设施（如球场、铺设的山径、亭台），而不是原野娱乐地带[26-27]。

五、休闲研究

历史上，休闲研究一直使用小规模、实证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虽然也有一些实验性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便是忽略了受访者自我陈述的休闲行为与受访者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关系可靠性的认知失调的影响。也就是说,对态度、观点和价值观,自我陈述的休闲行为与实际休闲行为的一致性不是很清楚。具体地说,对态度与行为之间不一致的认识导致了认知失协。由于认知失协会使人心理上产生不愉悦感,这样反而会促使人们力图减少不协调,实现协调。

因而,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比实际情况更多地参与运动和体育活动,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有益。例如,Chase 和 Godbey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比较他们的估计与调查数据之后,一个网球俱乐部和一个游泳俱乐部的会员普遍高估他们对两俱乐部的使用。客观的测量,包括诸如步数器和加速器等器械的使用,以及包括综合使用直接观察和录像的方法,或许能帮助克服这一问题[28]。

在过去的十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历时研究。该领域由于使用定性方法而变得更为先进,但仍需要更多的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和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以及单一主题设计(single-subject designs),也在休闲研究中被频繁使用[29]。

本文感到有意义的是由联邦政府所进行的覆盖面广的大规模调研系列。1999—2000 年娱乐与环境全国调查(NSRE)①是最新的系列研究。该研究始于 1960 年,由户外娱乐资源审议委员会(ORRRC)举办全国性调查。ORRRC 推出了全国娱乐调查(NRS),以评估美国的户外娱乐参与。自 1960 年以来,美国又进行了六次全国娱乐调查。

此外,对于时间利用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人们利用休闲和参与体育的理解。日记的研究和体验取样(使用"传呼机"作为工具)研究,可以得出相对可靠的行为估计。体验取样是通过"传呼机"对研究对象传呼或者不定时联系,以确定他们的行为[30-31]。

六、休闲研究的未来

通过使用征求休闲科学院成员意见的方法,我们做了一项探索北美休闲研究演化的实证研究。休闲科学院乃是一个由著名的休闲学者组成的荣誉组织②。研究使用了文化共识分析方法,以寻求确定普通休闲学术文化是否存在及该文化涉及哪些学术领域。

研究结果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结论,认为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对北美休闲研究影响最大,其次是社会学。或许北美休闲研究侧重(社会)心理学,说明该地区的社会环境能满足此研究方式的条件。大众休闲——真正意味着大部分人口可获得休闲——可能在该地区已经是名至实归了,即已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休闲。休闲在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理念,由于休闲公共供给有悠久的传统,休闲研究者就不必从政策角度或以批评的态度探求休闲。与其他发展稍逊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北美在休闲参与方面具有更大的社会公平,这样或许能使该研究领域至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允许以个性和心理研究为主导(虽然针对特殊人口,但往往对社会弱势阶层人口的研究是休闲研究的重要主题)。

至于将来会对休闲研究产生影响的学科,健康似乎排位第一,随后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心理学,这方面也已达成共识。毕竟,休闲研究是一个应用领域,应该反映社会环境,即社会对健康越来越关心。休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积极运动、减少压力的生活的一部分[32]。政府休闲、公园与娱乐服务部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与健康水平及医疗机构的关联度正不断加强。增多的肥胖症、久坐的生活方式、人口老龄化以及保健的高成本很可能会增强这种关联度。

---

① 参见 http://www.srs.fs.usda.gov/trends/Nsre/nsre2.html。

② 参见 J.Shim,"The Evolution of Leisur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Korea: A Study of Cultural Consensus,"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4。

研究者也一致认为，旅游业、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和户外娱乐（以此为顺序）将会是未来大学休闲课程最重要的专题。旅游业引起政府的重视，是因为它被视为发展或重振区域经济的手段。正如 Veal 所注意到的[33]，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旅游业的研究传统上采纳商业取向，而休闲研究则具有福利主义取向。旅游业将会成为休闲的一个重要子领域，可反映出普遍的社会趋势，即这种合并哲学已日趋流行（甚至在政府机构里），以及旅游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同。或许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就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外国学生对旅游专业的需求日益增加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在下列问题上学界很难达成共识，诸如什么环境推动了或将会推动休闲研究的发展，哪些是或将会是休闲研究的主要议题，以及休闲学者应该有何作为来提高这些专题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并非单一或少数力量，而是错综复杂的多股力量促进了休闲研究的发展，未来也很可能如此。休闲研究探讨各种议题，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受访者中没有一致认同的议题。Wallerstein 认为，一个学科乃是一个文化领域[34]，休闲研究领域缺乏共识可以被理解为该领域缺乏学科文化。或许在北美，休闲仍未能成为一个足够明确的研究领域，或许该领域就其性质而言还远远没有——或甚至不应该——形成统一方向，而应该适应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七、对中国休闲研究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或许北美休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的休闲研究必须寻求认识那些由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休闲变化，以及休闲服务供给组织的必要性。虽然有些必需的专题研究——诸如时间使用的描述性研究、工作与休闲活动的变化，以及各种娱乐、公园和文化场地与服务的使用与管理——与西方的休闲研究相同，但是中国的休闲研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与历史发展。中国社会强烈的集体性意味着在休闲方面对不同人群的分析可能要优先于社会心理学研究。

中国政府尚未发展出娱乐与公园管理职业，因此，应当重视政府和企业领域的休闲供给形式。在西方国家，政府资助的休闲服务乃是从旨在改革城镇生活的市民组织演化而来的。这类市民组织在中国基本缺失，虽然存在某些诸如推动交谊舞或当地体育运动的团体。北美的一部分休闲研究参与了改革城镇的休闲生活，另一部分则致力于认识现代生活中的休闲，而不考虑社会变革。因而，该研究领域出现了分歧：一方面是一种思想意识，即假设某些形式的休闲较为优越，人们必须得到帮助以适应城镇生活；另一方面是一种信念，即休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某一文化情境中的休闲，而不是改变休闲。中国学者如何应对这种分歧，还有待于观察。然而，中国的休闲研究似乎也不能无视普通公民获得更大休闲机会的巨大社会需求。未来十年，休闲如何塑造将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这一事实还未被认识到。

中国的休闲研究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在主要大学里是否应该设置该研究的某一具体学习课程，这已经在浙江大学实现了，在那里成立了亚太休闲研究与培训中心。中国许多其他大学也表现出更多的对休闲研究的参与热情，而不仅仅是旅游业和体育。其次是有关中国学者从翻译休闲专著——基本来自西方世界的——到撰写中国休闲专著的转变。几位中国学者已经翻译和撰写了部分休闲专著。

既然“休闲”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蕴含在古老文化中的新兴概念，中国学者可能会受到诱惑，耗费几十年时间来探讨休闲在中国情境里的含义。事实上，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要求他们超越这些问题而关注更具应用性和实用性的途径，以便改善中国人民每日生活中有意义的休闲的机会。此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开发商正在建造的高层住宅对即将搬入的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缺乏考虑。政府应有所作为，应要求这类建筑物在设计时照顾到儿童玩耍的需要、年轻夫妇或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

老年父母的休闲需求,即儿童们能在哪里玩耍?何时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大多数中国人所居住的农村也存在着问题。在乡村,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休闲基础设施?旅游业如何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休闲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关键研究课题,因为其重要意义显而易见。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和家庭。

(刘晓杰,刘慧梅 译)

[参 考 文 献]

[1] G.Cross, *A Social History of Leisure since* 1600,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1990.

[2] H.Cunningham, *Leis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0.

[3] R.Knapp & C.Hartsoe, *Play for America, The National Recreation Association*: 1906—1965, Arlington, VA: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1979.

[4] J.Dumazedier, "Prominent Recreationist Defines Leisure," *Recreation Canada*, Vol.32(1974), p.55.

[5] G. Lundberg, M. Komarovsky & M. McInerny, *Leisure: A Suburban Stu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

[6] H. Lynd & R.Lynd, *Middlet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7.

[7] G.C.Godbey, A.Graefe & S.W.James, *The Benefits of Local Recreation and Park Services: A Nationwide Study of the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shburn, VA: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1992.

[8] J. Crompton & B. McGregor, "Trends in the Financing and Staffing of Local Government Park and Recreation Services: 1964/5 to 1990/91,"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Vol.12(1994), pp.19-37.

[9] J.Crompton & A.T.Kaczynski, "Trends in Local Recreation and Park Department Finances and Staffing from 1964-5 to 1999—2000,"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Vol.21(2003), pp.124-144.

[10] G.Cranz,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11] U.Bronfenbrenner,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 J.F.Sallis & N.Owen, "Ecological Models," in K.Glanz, F.M.Lewis & B.K.Rimer(eds.),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2, pp.462-485.

[13] R.M.Ryan & E.L.Deci,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25(2000), pp.54-67.

[14] D.W.Crawford, E.L.Jackson & G.Godbey,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Leisure Constraints," *Leisure Sciences*, Vol.13(1991), pp.309-320.

[15] D.W.Crawford & G.Godbey, "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Leisure," *Leisure Sciences*, Vol.9, No.2(1987), pp.119-127.

[16] P.B.Baltes, "On the Incomplete Architecture of Human Ontogeny: Selection, 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as Foundations of Developmental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Vol.52(1997), pp.366-380.

[17] M.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0.

[18] H.Brya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Vol.32(2000), pp.18-21.

[19] R.A. Stebbins, *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Serious Leisur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V.A.Freysinger, "Life Span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s on Leisure," in E.L.Jackson & T.L. Burton (eds.), *Leisure Studies: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1999, pp.253-270.

[21] R.E.Manning,"Crowding and Carrying Capacity in Outdoor Recreation: From Normative Standards to Standards of Quality," in E.L.Jackson & T.L. Burton (eds.), *Leisure Studies: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1999, pp.323-334.

[22] R.Ditton, A.J.Fedler & A.R.Graef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erceptions of Recreational Crowding," *Leisure Sciences*, Vol.5, No.4(1983), pp.273-288.

[23] B.Shelby, "Crowding Models for Backcountry Recreation," *Land Economics*, Vol.56(2001), pp.43-55.

[24] G.R.Jacob & R.Schreyer, "Conflict in Outdoor Recrea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Vol.12, No.4(1980), pp.368-380.

[25] B. Sternfield, B.E.Ainsworth & C.P.Quesenberry, "Physical Activity Patterns in a Diverse Sample of Women," *Preventive Medicine*, Vol.28(1999), pp.313-323.

[26] C.Johnson & J.Bowker, "Onsite Wildland Activity Choic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White Americans in the Rural South: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Vol.30(1998), pp.101-120.

[27] L.L.Payne, A.J.Mowen & E.Orsega-Smith, "An Examination of Park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s among Urban Residents: The Role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Race and Age," *Leisure Sciences*, Vol.24, No.2(2001), pp.81-98.

[28] D.Chase & G.C.Godbey, "The Accuracy of Self-reported Participation Rates: A Research Note," *Leisure Studies*, Vol.2(1983), pp.231-233.

[29] R.Larson & M.Csikszentmihalyi,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in H.T.Reis(eds.), *Naturalist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Social Interac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83, pp.96-116.

[30] J.Robinson & G.C.Godbey,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 R.C. Mannell & D.A.Kleiber,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1997.

[32] G.C.Godbey, L.L.Caldwell & M.Floyd, et al, "Contributions of Leisure Studies and Recreation and Park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tive Living 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Vol.28, No.252(2005), pp.150-158.

[33] A.J. Veal, *Leisure and Tourism Policy and Planning*, Oxon: CABI Publishing, 2002.

[34] I.Wallerstein,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Dubious Discipl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44, No.4(2003), pp.453-460.

本刊讯：2008 年 4 月 21 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与韩中法学会共同主办的“2008 中韩法律论坛”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中韩学者围绕环境法、刑法、行政法三大部门法分别作了论文报告，并就报告会的内容提了许多深刻问题。全场学术氛围厚重，代表踊跃发言，不时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此次法律论坛涉及的法学研究领域非常宽广，所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目前中韩两国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论坛的举办非常成功，对韩中法学会今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